编者按

近年来，从国际上看，中国因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增长动能呈现出新的变化。如何客观评估和看待这些问题，并以科学高效的决策施策正确应对？5月16日，光明日报社与南京大学联合发布两份智库报告——“中国经济动能指数报告”与“中国经济全球化报告”，对此作出深刻解答。本版今刊发重点内容。

中国经济全球化报告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今天的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自主扩大进口，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垂直专业化分工逐渐成为人类组织生产活动的新方式。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给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全球化未来将何去何从？中国将如何应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分工位置

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4—2007年，2000—2014年间中国单位商品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从2000年的8.07%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点12.56%，在此之后下降到2014年的9.64%，其中，以工业部门为主的第二产业新增价值创造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服务业部门新增价值创造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指数从2000年的11.09%上升到2005年的15.62%，再下降到2014年的10.93%，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

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是反映一个国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的两个指标。分析发现，中国经济无论是上游度指数还是下游度指数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前者在分析期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后者增加幅度却非常有限。与中国经济整体相关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曲线在分析期间保持在零点附近小幅波动，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大体位于中游位置。作为制造业大国，分析期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指数始终为负，加入WTO后负数的绝对值有所扩大，应该与我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有关，2005年以来该指标有所回升，说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第一产业出口具有显性的比较优势，但分析期间显性比较优势有所下降，特别是2008年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在分析期间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趋势；第三产业出口具有显性比较劣势，但分析期间劣势在逐步缩小。将贸易方式区分为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后，可发现我国农业部门的最终产品出口比中间产品出口更具有显示比较优势，我国第二产业最终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要超过中间产品贸易，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对于我国第三产业而言，无论是传统贸易还是中间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分析期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最终产品贸易引起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期间得到了有效提升，其中中间产品贸易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中间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高于最终产品贸易，分析期间的上升趋势也更为显著。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和感应度

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建立，中国经济顺利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感应度和影响力变化有所差异。其中，对于欧美发达地区的感应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影响力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与欧美相比，我国对亚洲周边地区的感应度提升程度有限，影响力近年来反而有所下降；对于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地区而言，我国对其感应度提升程度非常有限，但是影响力在分析期间有了明显提高。在三次产业中，我国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感应度和影响力并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二产业在感应度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影响力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

将中国经济增长区分为基于国内价值链创造和基于全球价值链创造的两部分，基于国内价值链所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占我国GDP总量比例从初期的91.96%下降到期末的90.33%，分析期间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基于全球价值链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占比上升了1.63个百分点，说明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近年来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加入WTO后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2002—2008年间，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与其相关的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于2006年达到最高点28.03%。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2014年出口拉动的增加值占比下降到19.27%，以投资和消费为主的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伴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构建，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割成不同部分，并根据各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配置，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三次产业各组成部分占比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即基于国内价值链且满足本国最终需求的增加值在总量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相反，与出口相关部分的增加值部分占比并不高，且在分析期间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基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GDP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对于国内价值链而言，第一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要更大一些，对于全球价值链而言，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要更高一些。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提高，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也进一步扩大，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逆转，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为3.79%，2014年已上升到13.93%，分析期间上升了10.14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虽然也取得较大收益，但由于其处于高收入阶段，GDP增长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缓慢，导致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从数量角度而言，全球价值链对中国GDP在世界总量中占比的推动作用比不上国内价值链，但从增长速度而言，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却更快一些。中国制造业部门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0年时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总量中占比仅为6.72%，但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25.01%，分析期间上升了18.3个百分点。深入分析可见，虽然制造业大部分新增价值都是基于国内价值链所创造，但融入全球价值链却加快了其发展速度，说明参与国际分工对于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逆全球化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原因。面对日益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推动逆全球化来维持原有的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由于承担角色而引发的新矛盾，也是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之一；收入分配不均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虽有诸多不足，但却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中国加入WTO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世界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也有所下降。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巨大收益，其中，发达国家由于分享了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收益更为显著一些。

新经济全球化方案实施的对策建议

结合本报告研究结果，针对“新经济全球化”方案实施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因为逆全球化等国际因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近年来有一定回落。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大作为。

中国要有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重要功能的准备，要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要协调好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共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中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不应轻率地引发贸易摩擦。

要在广阔内需基础上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企业要利用广阔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

将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结合起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抓住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通过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

要通过技术能力提升和品牌建设等，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地位。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要努力向“微笑的曲线”两端攀升，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减速现象，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逆转密切相关。因此，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中国要韬光养晦，在修炼好内功的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抓住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打下坚实基础。

（执笔人：刘瑞翔、颜银根、戴枫）

理论部主办
电话：010-67078979
邮箱：gmthinktank@126.com

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报告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回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经济增长动能的综合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经历了2002—2007年持续增长、2008—2010年小幅上升、2012年以来几乎停滞三阶段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其构成项归纳为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与结构转换动能三类，在此基础上构造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总体上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趋势，还能针对各种动能呈现的增长、停滞、趋缓等不同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进入历史抉择时期。人均GDP的增长一旦转向依赖于经济发展质量，就要依赖于新兴行业发展和传统行业改造中大规模的创新投资，进而依赖于中等收入水平所释放的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需要通过深化教育与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激励，以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方式释放动能，带动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个时期的动能将呈现分散化、多渠道、渐进式的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总体处于不断累积上升状态

2001—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的走势呈现出持续上升的状态，增长动能处于不断累积上升阶段。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发生过两次重大转换，一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引发的经济增长动能，带动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巨大投资动能以及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强化了高速增长方式。这次动能的增长效应在几年后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因为资源配置扭曲、结构失衡而趋缓。

全要素增长率在2008年后进入一个较低水平徘徊时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左右仍然维持原有的增长方式。增长动能在2008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动能指数增长率转为下降，在一个水平上波动。全要素增长率在2012年随着动能指数增长率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基于上述特征，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之后并未立即出现显著的技术前沿扩张。可喜的变化是，动能指数增长率2014年以来呈现出上升势头。

“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演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由此构造的“新动能”指数在2008年就已经出现由降转升的阶段。相对应的“常规动能”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在2011年之后出现了下降趋势，“新动能”指数在2013年超过“常规动能”指数，可称为“新旧动能”转换。

从增长率看，“新动能”增长率在2007年前与“常规动能”增长率交替变动，波动程度大于“常规动能”增长率，而且“新动能”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绝大部分时期均高于“常规动能”。

“新动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新动能”指数构成项主要涉及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动能，这就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来源是持续增强的创新动力及相应的结构转变。

需求侧动能潜力有待释放

需求侧动能呈现出周期波动式上升趋势，2002年之后有三个周期，分别是2004—2008年、2008—2012年、2012—2016年。每个周期持续约5年。2012—2016年的周期结束后，需求侧动能能否进入上升通道，启动下一周期，还有待于消费升级动力释放。

以2002、2003年为参照系，2004年以来我国的需求侧动能总体上低位徘徊，没有呈现出中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预期的需求爆发式增长。从城镇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动能指数对比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动能在绝大多数年份低于农村居民，只有2010、2013年正增长时才略高于农村，2014—2016年城镇居民的需求动能又迅速下降，低于农村居民。究其原因，在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上，城乡居民在居住支出占比增长方面的差异显著大于其他消费支出差异。由此得出，居住支出占比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居民需求动能的提高。

从外需动能来看，呈现两次阶段性变化。2009年之前外需动能主要由国外部门指标贡献。从2009年开始，外需动能转换成由国内部门指标贡献。可以说，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产业升级，即出口产品中的中间投入从国外中间投入为主转变成以国内中间投入为主。

供给侧动能着力点在于激发创新动能

供给侧动能2008年前后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2015年以后开始加速上升。在供给侧动能构成中，人力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动能在2003—2007年呈下降趋势，在2007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显著持续上升。我国2007年出现较为普遍的“用工荒”，人力资本密集度由降转升。高技能劳动力密度持续上升将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劳动力质量改进与存量增长放缓并存的趋势。从较长时期看，应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而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将是一个长期过程。2016年出现了新的较快增长势头，同期TFP增长率几乎降为0。这意味着，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动能还处于不断累积中，由其作为根本因素决定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回升可以期待。

创新动能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出现一种持续上升的通道，在经济周期内底部既没有大幅下降，上升时也没有明显增幅，2011—2014年创新动能几乎停滞，这应是“中国制造2025”行动规划在2015年面世的一个原因。创新动能指数何时再次进入上升阶段并持续较长时期，还有待于“中国制造2025”行动规划持续有力地推进、落实。

金融发展动能指数总体上在周期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到2013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3—2016年维持缓慢上升态势。

结构转换动能受制于开放型发展放缓

结构变迁一直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结构转换动能在2011年前一直稳定上升，2011年之后进入停滞，且稳中有降。该趋势显示出2011年之后结构变迁动力不足。

在结构转换动能中，2013年之后，资本替代劳动所形成的资源再配置动能与全球价值链攀升动能增长较为明显。各产业吸收的资本深化动能持平，与同期呈现相同趋势的创新动能、同期显著上升的人力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动能结合起来，显示出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初期。这一阶段，虽然创新驱动具有了人力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在吸引大规模资本投资增长的重大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来自三次产业结构转变的动能从2011年开始由升转降，就业结构变化以较快速度显著下降，增加值结构变化较为缓慢地下降。在201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有的产业吸收劳动力的动能减弱，进入了替代劳动力要素的发展阶段，有的产业吸收劳动力的动能在增强，但是没有带来经济总体的增长态势。

出口产品空间攀升动能2002—2010年总体上呈现增强态势，2011—2016年稳中有降。作为指数分母的成本变化趋势和生产率变化趋势并未改变，这说明由我国生产能力所决定的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

2013年后，上述各项结构转换动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资本、劳动力要素和中间产品分工等微观层面上的结构变化动能在加强，产品、产业层面的结构变化动能在减弱。这进一步说明了实现产业结构变化的微观主体——企业在产出方面增长趋缓，但是在投入方面积极调整结构，积蓄着潜在的增长动能。

开放型发展动能综合了涉及对外开放的各方面动能。2003年以来，这一动能持续上升，出口产品空间攀升动能减弱并未抵消由比较优势带来的上升趋势，但是对开放型发展动能增长势头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

应实行要素和微观主体激励导向的政策创新

由上文指数分析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结构上已经转换到要素、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动能上，当前应切实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应重视以下四个方面：

把释放居民消费升级动能、促进企业创新动能作为政策创新重点；增加、增强针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与才能发挥、针对全球价值链上企业技术与创新能力提升的激励政策；深化开放发展战略，面向国际市场中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促进国内中间产品部门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扩大国内外分工、技术与知识交流、相关要素与产业的国内外市场开放与进入；让企业创新活动或创新发展获得更多的直接融资，提升金融发展动能。

（执笔人：郑江淮、宋建、张玉昌、郑玉、姜青克）

智识

发挥智库作用 推动互联网与智库深度融合

石森昌

智库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视与支持，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仍较为落后，资源配置不够科学，制约着智库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云智库对“互联网+智库”的引领作用，推动互联网与智库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智库组织网络化、智库服务管理专业化和智库资源集成化水平，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智库服务新模式，有助于持续提升智库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能力，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

云智库助力实现智库组织网络化。云智库是采用云计算模式，利用互联网将专家学者、智库服务人员、数据信息资料、网络软件和硬件设备等资源汇集起来，通过互联网或主要通过互联网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综合型智库服务的新型智库服务模式。与传统智库服务模式的区别在于，云智库主要依托互联网组织开展各种决策咨询服务活动，推动决策咨询服务线下、线上无缝对接，既具备通过互联网完成决策咨询服务全过程的能力，又能对线下决策咨询服务活动给予全程支持。作为决策咨询服务需求方的党和政府部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利用各类互联网接入终端，便捷地从云智库中获得决策咨询服务。同时，作为决策咨询供给方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云智库助力推动智库服务管理专业化。在传统智库服务模式下，党政部门和专家学者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决策咨询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如党政部门需要选择专家团队、协助调研、组织项目评审等，专家学者需要寻找需求信息、参与投标和组织调研等。在云智库服务模式下，决策咨询服务过程管理由云智库组织完成。党政部门需要决策咨询服务时，向云智库发出决策咨询需求信息；云智库平台确认后，向专家库中相关领域的专家推送需求信息，有意向的专家向平台递交方案计划；平台协助需求方组织评价备选方案计划并选定专家团队承担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平台可协助专家团队收集数据资料和开展调研活动；成果提交后，平台协助需求方组织人员进行评审，督促专家团队调整方案，协助供需双方结项，完成决策咨询服务。因此，既提高了服务效率，又把党政部门、专家学者从烦琐的决策咨询项目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

云智库助力强化智库资源集成。借助于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云智库跨地域统筹和利用资源，增强了智库服务能力。一是人才资源集成。通过建设网络专家管理库，突破人才储备的地域和体制限制，汇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多层次、多年龄结构、跨区域的智库专家团队。可以根据需要，借助研究团队网络组建机制，随时组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专业研究队伍，凝聚集体智慧为党和政府部门提供综合型、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依托专家虚拟工作室，为专家提供展示研究能力和成果的网络空间，促进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二是数据资源集成。通过建设网络数据中心，推进数据共享和创新研究技术。将散落在智库机构内部各个部门的数据资料进行集中整理，纸质数据资料要进行电子化，建设专属信息化数据库。建设跨部门、跨机构的共享数据库和数据分析公共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专家学者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提供问题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路。三是实践动态集成。通过建设虚拟实践基地，创新智库机构和实际部门联系机制。打造智库机构与实际部门进行决策咨询服务和工作交流的虚拟空间，实际部门可以根据情况把本部门的最新发展情况、工作总结、数据报表上传云智库数据中心，成为储备数据；实际部门可以在虚拟实践基地上随时提出决策咨询请求，云智库组织专家进行解答；虚拟实践基地也是展示双方合作交流成果的重要平台。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光明智库》电子期刊。